

冷战后俄罗斯 与北约安全困境的形成与升级*

杨 雷 张莉霞

【内容提要】 俄罗斯独立后与北约逐步形成安全困境，但双方至今没有爆发直接军事冲突，其原因在于欧洲独立主权意识的增强、俄罗斯的核威慑以及北约在常规军事实力上的优势等限制性因素的存在。这些因素延缓了安全困境的进一步升级。但俄乌冲突爆发后北约积极支持乌克兰，这意味着双方目前站在了一个非常危险的转折点上，双方都在向进攻性现实主义理念转变，安全困境可能转变为一个导向战争的螺旋。如果彼此不能通过和平谈判进行妥协，改变敌对认知，则双方直接军事冲突或难避免。从世界和平角度看，俄罗斯和北约不应再继续放任或推动事态进一步升级，而应采取“示善”措施，加强相互间合作，为双方紧张关系降温，为恢复乌克兰的和平创造条件。

【关键词】 俄罗斯 北约 安全困境 俄乌冲突 俄罗斯—北约关系

【作者简介】 杨雷，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副教授；张莉霞，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学生。

2022年2月24日，俄罗斯对乌克兰采取特别军事行动，双方军事冲突延续至今，北约国家深度介入其中，这深刻影响着国际体系结构和国际形势的发展。俄乌冲突的核心在于北约与俄罗斯之间不断恶化的安全困境。俄罗斯与北约之间的安全困境自苏联解体、双方放弃敌对关系后开始形成，期间虽有缓和，但是总体呈现出愈演愈烈之势。尽管如此，双方间还没有发生直接军事冲突，其制约因素是什么？2022年11月，在毗邻乌克兰的波兰境内坠落了两枚导弹，乌克兰推波助澜，认为这是俄罗斯对波兰的战争行为，呼吁北约启动第五条款立即向俄罗斯宣战，结果被

*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俄乌冲突背景下中美俄三角关系的走向及对策研究”（22AGJ002）的阶段性成果。

美国总统拜登紧急叫停。美国指出，落入波兰境内的导弹残骸是乌克兰拦截俄罗斯导弹的武器所致。俄罗斯与北约之间可能发生的直接军事冲突就此避免。类似事件后来多次发生，这表明俄罗斯和北约都不愿意直接开战，但是这种状况还能持续多久？随着俄乌冲突的不断发展，俄罗斯与北约都不断加大在乌克兰境内的博弈力度，双方的敌对行为事实上已经超越了代理人战争的范畴，而处在了接近直接战争的灰色地带。对此，俄罗斯和北约做得多、说得少，一致回避对事态性质的明确界定，以免促发双方间的直接战争。那么俄罗斯和北约的矛盾最终是否会升级为直接的军事冲突？本文将在安全困境理论视角下对上述问题进行分析。

一 俄罗斯—北约关系文献综述

俄罗斯与北约的关系一直以来都是国内外学术界关注的重要问题。国内外学界对此问题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四个方面：首先是北约东扩对俄罗斯—北约关系发展的影响；其次是乌克兰问题对俄罗斯—北约关系的影响；再次是俄罗斯与北约安全困境的形成；最后是大国对俄罗斯—北约关系发展的影响。

（一）北约东扩与俄罗斯—北约关系

北约东扩是俄罗斯—北约关系的核心矛盾，国内外学术界对于北约东扩的相关研究从 20 世纪 90 年代一直持续至今。有学者认为北约东扩迫使俄罗斯在外交政策的制定和实施上更加重视地缘政治利益，使俄罗斯国内的欧亚主义思潮渐居上风，造成俄罗斯与北约之间离心倾向加大^①。俄罗斯在国际社会和地区事务中的处境更加艰难，与美国以及北约之间的关系恶化^②。北约东扩是美国采取的战略扩张，而俄罗斯得到的补偿只是战术性的、策略性的，两者不在一个层面上^③。北约东扩有意识地采取了“双轨战略”，在渐进式接纳新成员国的同时，还持续对俄罗斯进行“战略安抚”^④。面对北约东扩，俄罗斯的反应从试图通过与北约开展有限合作来分散其所受损害转变为主动的遏制政策^⑤。多数学者认为

① 俞邃：《北约东扩以来的俄罗斯外交》，载《国际问题研究》1998 年第 3 期。

② 刘桂玲：《俄罗斯应对北约东扩举措及俄美关系前景》，载《现代国际关系》1999 年第 6 期。

③ 陶文钊：《北约东扩与美俄关系（1993—1997 年）》，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8 年第 10 期。

④ 吴文成：《从科索沃战争到乌克兰危机：北约东扩与俄罗斯的“战略觉醒”》，载《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2022 年第 3 期；韩克敌：《北约东扩与乌克兰危机》，载《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2022 年第 5 期。

⑤ Andrei P. Tsygankov, “The Sources of Russia’s Fear of NATO”, *Communist and Post-Communist Studies*, 2018, 51 (02), pp. 101–111.

北约东扩是欧洲与俄罗斯双方关系恶化的主要原因^①。但也有学者认为北约东扩虽然是欧洲对冲俄罗斯复兴战略的产物，但因为其允许成员国与俄罗斯开展互利合作，且不需要成本极其高昂的威慑措施来保护其最脆弱的成员，所以北约扩大有利于欧洲安全^②。还有学者认为，俄罗斯与西方关系的恶化不是北约东扩带来的，而很可能是俄罗斯对其自身在国际事务中的影响力下降所作出的反应所致。虽然俄罗斯从一开始就对北约扩大作出了负面反应，但民族主义力量和俄当局有意放大了这种反应，以服务于国内政治利益^③。总体上看，对于北约东扩是否应为俄罗斯—北约关系的恶化负主要责任，学界还存在争论。但学界普遍认为北约东扩对俄罗斯形成了战略威胁和压力，对俄罗斯—北约关系的发展产生了负面影响。本文就是建立在这一共识的基础上。

（二）乌克兰问题与俄罗斯—北约关系

乌克兰问题与俄罗斯—北约关系的发展密不可分。有学者认为乌克兰问题的本质在于俄罗斯与北约之间存在结构性困境。北约为了追求最大化的联盟安全，积极推进将乌克兰纳入北约，但俄罗斯在乌克兰问题上没有妥协的余地，因为退让将会在俄罗斯国内造成一系列严重问题^④。美国政府有意通过乌克兰问题在俄罗斯边境制造混乱，不断削弱俄罗斯，同时破坏俄罗斯与欧洲之间原有的稳定关系^⑤。还有学者认为，乌克兰危机的爆发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北约的“生存危机”，俄罗斯—北约双方严重的战略互疑促使彼此走向对抗^⑥。乌克兰问题导致俄罗斯—北约双方之间的斗争范围扩大，欧洲安全架构将出现分治趋向^⑦。乌克兰问题是俄罗斯—北约双方的利益冲突点，对于理解俄罗斯—北约关系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国内外学界已经从不同角度对乌克兰问题进行了深入而详尽的研究，但由于乌克兰危机出现了新的发展，原有研究对新发展的解释存在不足，同时也缺

① Anna - Sophie Maass, "Kaliningrad: A Dual Shift in Cooperation and Conflict", *East European Politics*, 2020, 36 (04), pp. 515 - 528.

② Lanoszka, "Thank Goodness for NATO Enlargement", *Int Polit*, 2020, 57, pp. 451 - 470.

③ Marten, "NATO Enlargement: Evaluating its Consequences in Russia", *Int Polit*, 2020, No. 57, pp. 401 - 426.

④ 庞大鹏：《乌克兰危机折射俄罗斯与西方关系结构性困境》，载《当代世界》2022年第2期；赵会荣：《乌克兰危机的多维探源》，载《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2022年第4期。

⑤ 黄登学、刘佩鹏：《新一轮乌克兰危机背后的大国战略博弈及前景》，载《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2021年第4期。

⑥ 张建：《欧洲安全格局视角下俄罗斯与北约的关系及趋向》，载《和平与发展》2019年第4期。

⑦ 王秋怡、许海云：《乌克兰危机后北约对俄罗斯安全战略及其转型分析》，载《现代国际关系》2019年第8期。

少从理论视角进行的系统性分析。

（三）俄罗斯—北约关系中的安全困境

国内外也有少量文章涉及俄罗斯—北约关系中的安全困境。关于俄罗斯与北约陷入安全困境的原因，有学者认为源于冷战的历史文化发展，冷战后的权力不平衡加剧了该趋势^①。俄罗斯和北约之间未能建立具有约束力的制度安排是其中最关键的原因^②。有学者认为，美国—北约—俄罗斯的关系应该被理解为一场进攻性现实主义的悲剧，三者都是修正主义国家，它们的偏好和大战略使它们陷入了冲突^③。

（四）大国对俄罗斯—北约关系发展的影响

中国和美国在俄罗斯—北约关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有学者认为中国因素已经开始间接但显著地影响俄罗斯的北约政策和俄罗斯—北约关系。美国在其中的影响与其对俄政策取向密切相关：俄罗斯—北约关系在特朗普和拜登政府时期呈现出不同的特征。特朗普政府时期，美国作为北约的领导者更关注联盟内部成员国而不太重视北约的对手和敌人，而拜登政府则显示出与特朗普政府截然相反的取向，拜登重新将北约的关注重点转向了俄罗斯。由此可见，俄罗斯与北约的关系至少在拜登执政期间很可能会保持紧张状态^④。

综上所述，现有的相关研究还未建立一个有效的分析俄罗斯—北约关系逐步恶化的理论框架。本文试图运用安全困境理论作为分析工具，对俄罗斯—北约之间的冲突关系进行分析。安全困境理论常被运用于解释国际社会冲突现象的形成，它有效解释了为什么寻求安全的国家可能最终陷入冲突，即使它们彼此间并没有恶意。由于国际组织，特别是安全领域的国际组织，其行为与国家的行为具有高度一致性，因此该理论对于目前俄罗斯与北约之间关系不断恶化但是双方都力避战争的现象有着很好的解释力。北约与苏联领导下的华约原本是两个敌对阵营，不存在安全困境，但是在 20 世纪 80 年代末苏联从东欧撤军、解散华约时起，特别是俄罗斯独立后，俄罗斯—北约关系发生了实质性变化：双方放弃了敌

① Andrei P. Tsygankov, “The Russia – NATO Mistrust: Ethnophobia and the Double Expansion to Contain ‘the Russian Bear’”, *Communist and Post – Communist Studies*, 2013, 46 (1), pp. 179 – 188.

② Andrej Krickovic, “When ties do not bind: the failure of institutional binding in NATO Russia relations”, *Contemporary Security Policy*, 2016, 37 (02), pp. 175 – 199.

③ Sushentsov, “The Tragedy of US – Russian Relations: NATO Centrality and the Revisionists’ spiral”, *Int Polit*, 2020, 57, pp. 427 – 450.

④ 吕萍：《俄罗斯的“欧洲选择”分析》，载《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2021 年第 6 期。

对态度，走向和平合作，这就为双方安全困境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二 安全困境理论综述

安全困境理论是防御性现实主义的逻辑核心，是防御性现实主义的理论支撑点^①。防御性现实主义认为，国际冲突中的一些（但不是全部）冲突主要是由安全困境和误解驱动的。其基本理论观点如下。

（一）基础概念

最早提出安全困境这一理论概念的是赫兹和巴特菲尔德。赫兹在其1950年发表的《自由主义者的国际主义与安全困境》一文中将安全困境定义为“国家担心自己的安全可能受到其他主体的攻击，为了获得安全，他们被迫追求更多的权力，以抵抗他人的影响。这导致其他人更加不安全，并促使他们为最坏情况作准备。权力竞争导致了国家追求安全和权力积累的恶性循环”^②。他认为“对他国意图的不确定性”和由此带来的焦虑是国家陷入安全困境的主要原因。即使国家可以确定其他国家当前的意图是善意的，他们也不能忽视其他国家在未来变得咄咄逼人的可能性，也不能可信地保证自身安全。基于对彼此意图的不确定性和恐惧，各国将权力或能力的积累作为防御手段，这些能力不可避免地包含一些进攻能力。巴特菲尔德认为安全困境导致战争最有可能在两个急于避免冲突的大国之间爆发^③。认为造成安全困境的直接原因是“霍布斯恐惧”，对他人意图的不确定性在安全困境中起到了关键作用，心理因素加剧了安全困境。罗伯特·杰维斯对安全困境的概念进行了深入的发展，认为安全困境出现的根源在于国际关系的无政府状态^④。他强调安全困境是结构性的，国家对他国意图的不确定性和恐惧对于形成和维持安全困境至关重要。在罗伯特·杰维斯的努力下，“安全困境”逐渐由一个概念发展成为比较系统的国际关系理论^⑤。

（二）安全困境的根源

在赫兹、巴特菲尔德和杰维斯对于安全困境概念作出定义的基础上，众多学

① 崔海宁：《现实主义权力理论比较分析》，载《国际关系学院学报》2004年第1期。

② Herz John H, *Political Realism and Political Idealism - A Study in Theories and Realitie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51.

③ Butterfield Herbert, *History and Human Relations*, London: Collins, 1951.

④ Jervis Robert, *Perception and Misperception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6.

⑤ 周桂银：《“安全困境”：一项概念史研究》，载《南大亚太评论》2021年第1期。

者对安全困境理论的各个变量以及作用过程进行了深入分析。防御性现实主义代表学者华尔兹认为，世界处于无政府状态，安全是国家的最高目标^①。国家不信任其他国家，总是试图最大限度地提高自己的安全。国际体系的结构特征——无政府状态是安全困境产生的根源，这一观点得到了学术界的普遍认同。但是安全困境是有条件的，而不是绝对的。缺乏恶意是形成安全困境的必要条件之一。只有两个无恶意的国家之间才能出现安全困境，否则不存在安全困境。进攻性现实主义国家是追求权力最大化的国家，因此是有恶意的，而防御性现实主义国家是寻求自身安全的国家，因此是良性的。安全困境只存在于两个防御性现实主义国家之间，其形成的直接理由是它们无法确定或者误解了彼此的（善意）意图^②。

（三）存在安全困境的双方是否必然走向战争

安全困境起初由防御性行为引起，因此是无意的，但它往往会产生意想不到的悲剧性结果即战争。安全困境发展到直接冲突是一个可逆的动态过程。杰维斯认为安全困境走向真实冲突的过程看起来像一种螺旋，但唐世平认为要对安全困境和螺旋进行区分。螺旋表示一种两国间的紧张持续增加的情境，螺旋可以由安全困境引发，但不是所有螺旋的产生原因都是安全困境。螺旋是普遍的，而安全困境是条件性的。在对螺旋和安全困境进行区分的前提下，唐世平认为，安全困境最终走向战争要经历一个螺旋过程，安全困境—螺旋—冲突三者之间是一个可逆的逐步进行的连续过程^③。

（四）如何缓解安全困境

华尔兹认为安全困境无法彻底摆脱，但可以得到控制。杰维斯提出通过心理和物质两种方式能够对安全困境起到调节作用：一方面，意图的不确定性和恐惧是造成国家间安全困境出现的关键原因之一。现实主义认为可以通过“示善”行为，即作出合作姿态和发出合作邀请向其他国家展现和承诺自己的善意，与此同时，根据其他国家对自己努力的反应推断他们的意图，从而达到减少意图的不确定性，降低恐惧的效果；另一方面，非对称权力因素是一个非常重要和关键的物

^① 刘文祥、陈路：《防御性现实主义与进攻性现实主义理论之评析》，载《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4期。

^② Tang Shiping, "The Security Dilemma: A Conceptual Analysis", *A Theory of Security Strategy for Our Time*,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10, p. 53.

^③ Tang Shiping, "The Security Dilemma: A Conceptual Analysis", pp. 33 - 71.

质调节因素，在一个非对称性权力关系中，较弱一方将更为敏感，更可能反应过度。在杰维斯观点的基础上，唐世平认为，要重视非对称性权力的调节作用。他认为“在一个非对称性权力关系中，较弱一方将更为敏感，因而更可能反应过度。如此，为了减轻或至少限制安全困境，强国更需要让人安心和自我约束”^①。

三 俄罗斯与北约的安全困境

基于安全困境理论的主要观点，本文认为冷战结束至今的俄罗斯—北约关系发展是一个从“休眠”安全困境到被激活为“深度”安全困境，并很有可能已经转变为导向战争螺旋的动态连续过程。三个环节的关系紧密相接，步步升级，环环相扣，但也存在一定的可逆性。在俄罗斯独立初期，俄罗斯—北约双方之间存在一个“休眠”的安全困境，但后来被激活、恶化为一个“深度”的安全困境，这一状态在重要限制因素的作用下被延缓了升级进程，从而得以在一段时期保持稳定状态。但由于双方间恐惧和意图不确定性问题依然没有得到改善和解决，这一稳定的“深度”安全困境状态注定会被打破。2022年2月俄乌冲突爆发后，俄罗斯—北约关系的急剧恶化显示出双方已经从“深度”安全困境转变为导向战争螺旋的初期阶段。为了避免直接冲突的发生，双方需要采取必要措施来阻止这一进程，以推动俄罗斯—北约关系实现逆向螺旋转变。

（一）“休眠”的安全困境

俄罗斯与北约是两个不同的安全阵营，存在客观上的利益冲突。客观利益冲突是否可以调和是判断俄罗斯与北约能否适用安全困境的重要条件。如果双方之间的客观利益可调节，则在某些情景下安全困境理论可以适用。具体的适用条件还需要通过双方的军事理论和行动的证据来进一步判断对方是否具有恶意，也就是说作为不同阵营的俄罗斯—北约双方不一定彼此怀有恶意。安全困境与利益冲突是相容的。两国间利益冲突的存在既不是它们之间存在安全困境的必要条件，也不是充分条件。防御性现实主义并不认为所有的冲突都必然发生，当两国间的利益冲突是虚幻的或者可调节的，且没有一方拥有恶意的时候，这两个国家可以通过“安全困境之下的合作”来避免冲突的发生。当利益冲突既在客观上又在主观上处于可调和的情境时，安全困境将保持休眠状态。此时双方都正确地认识到，它们之间的利益冲

^① Tang S, “The Security Dilemma: A Conceptual Analysis”, pp. 33 – 71.

突是可以调和的，因而均未对对方怀有恶意。受主观因素的影响，双方间能够激活安全困境的权力竞争不会发生，安全困境保持休眠状态。在这种情景下，双方间不容易发生冲突，因为双方均寻求以合作的方式来调节利益摩擦。

冷战结束后初期，俄罗斯与北约的关系进入“蜜月期”，双方都放弃了冷战时期的敌对关系，以寻求合作为关系主线。北约国家普遍支持俄罗斯政治转型、经济上实施休克疗法的做法，以期巩固和壮大西方民主国家的阵营。1990 年 7 月，时任北约秘书长曼弗雷德·韦尔纳访问了莫斯科，宣布对抗时期已经结束，双方必须埋葬过去的敌意和不信任。时任美国国务卿詹姆斯·贝克也提出俄罗斯应成为北约成员国，向俄罗斯释放了善意。这一时期的俄罗斯为了能够拥有一个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以处理独立初期非常复杂和混乱的国内问题，在对外政策上奉行向西方国家“一边倒”的政策，很快成为北大西洋合作理事会的创始成员国。为了获取北约方面的信任，俄罗斯在 1992 年 2 月与北约达成协议，规定双方在广泛领域开展合作。1994 年 6 月，俄罗斯正式签署了北约《和平伙伴关系计划框架文件》，获得了核大国的特殊地位。叶利钦政府以妥协性外交战略为基础，对北约采取了积极接触与合作的政策。

由图 1 可看出，冷战结束后至 1999 年科索沃战争爆发之前，俄罗斯与北约主要大国在军费开支上都呈现出缩减下降的趋势，侧面印证这一时期俄罗斯—北约关系的接近。在俄罗斯主权独立的新起点上，俄罗斯和北约都没有感受到彼此的安全威胁，这一时期俄罗斯—北约之间的安全困境处于“休眠”状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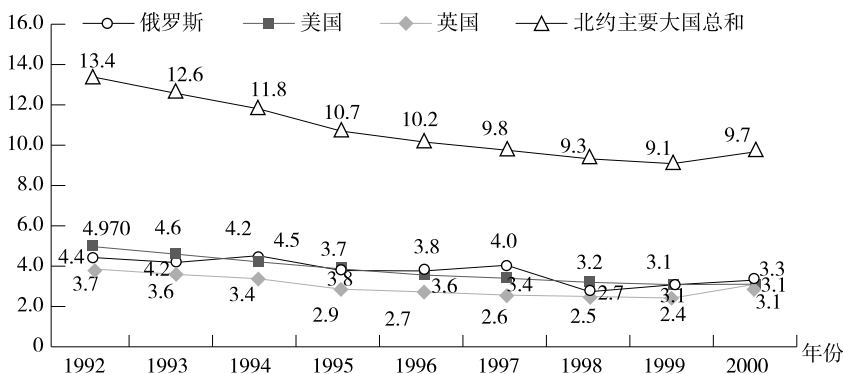


图 1 1992 ~ 2000 年俄罗斯与北约主要大国军费占 GDP 比值 (%)

数据来源：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SIPRI Military Expenditure Database, <https://www.sipri.org/databases/milex>

尽管从1995年起北约开始推动东扩计划，俄罗斯的反也对趋向激烈，但俄罗斯与北约之间“休眠”的安全困境一直到1999年后才被真正激活。部分原因在于，为了顺利推行东扩计划，北约一再设法掩饰这是针对俄罗斯的举措，并对俄采取了一系列安抚措施，如1996年4月中旬“G7+1”峰会在莫斯科举行，1997年5月签署的《俄罗斯联邦与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相互关系、合作和安全基本文件》（下文称《俄罗斯—北约基本文件》）。《俄罗斯—北约基本文件》确定了俄罗斯与北约的外交关系框架，双方不把对方视为潜在的敌人，共同努力缓和过去形成的对抗关系，明确北约没有在新成员国领土上部署大规模军事特遣队和核武器的意图。《俄罗斯—北约基本文件》暂时缓解了俄罗斯对北约东扩的怀疑、恐惧和战略焦虑，俄罗斯将该文件看作是北约对自己的一个承诺，双方之间的安全困境因为俄罗斯依然对北约怀有信任而没有进一步升级。但在实践中，北约在完成第一轮东扩后不久开始着手在新成员国境内进行军事部署和军事演习，打破了俄罗斯对西方的幻想，使俄罗斯对西方的信任急剧下降，也为后来的俄乌冲突埋下了伏笔。2021年12月，俄罗斯公开提出新的俄与北约成员国安全保障措施协议，内容包括北约放弃进一步东扩、北约承诺不把乌克兰等国纳入北约、双方关系恢复到1997年的状态等。这说明俄罗斯认为北约违约是双方关系恶化的最主要原因，北约要为双方关系恶化和俄乌冲突的爆发负责。但这一协议遭到了美国和欧洲国家的拒绝，从而直接引爆了2022年初的俄乌冲突。

俄罗斯与北约对彼此的不友好认知并没有随着冷战的结束而彻底消失，它短期内在双方积极寻求合作的氛围下得到部分缓解，但是在双方冷战思维根深蒂固的影响下开始复活并不断加深，彼此之间的抵制和怀疑态度逐步扩大，这极大地限制了双方刚刚建立起来的合作机制的运转。由于这种怀疑和抵制根源于国际社会的无政府性，无法得到有效的解决，这也注定了俄罗斯—北约双方之间“休眠”的安全困境必然是暂时的、不稳定的。

（二）安全困境被激活

当俄罗斯和北约间的利益冲突处于客观上可调和但主观上不可调和的情景下时，安全困境被激活。在此情境下，主观的不可调和性或许在最初时就存在，也可能是安全困境被激活所引发的一方或双方的错误信念所导致的产物。不可调和性或不相容性的最初产生往往是由于错误知觉。当一方或双方错误地认为它们的利益冲突不可调和，但是双方均未怀有恶意的時候，一个真实的安全困境就产

生了。在这种情境下，双方的冲突可能发生，但是通过妥协与合作又能将之避免。结果的不同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双方是否能认识到它们的利益并非真正的不可调和。如果一方能够设法发出信号以表达自己的善意，并了解对方的意图，那么冲突就可以避免。尽管如此，双方走向冲突的概率仍然很大，因为安全困境很容易被一方或双方的失误所激活，导致双方陷入主观的利益冲突中。在这样的情境下，双方间的主观利益不相容性被扩大，并塑造出或进一步扩大双方在客观利益上的对立。总之，安全困境可以促使两个本来相互无恶意的国家变得相互具有威胁性，导致它们认为彼此的安全利益互不相容，在一定条件下促使双方对立。

北约不顾俄罗斯感受的东扩促使双方间安全困境日益凸显。1999 年 3 月，北约不顾俄罗斯反对，将波兰、匈牙利和捷克吸纳为新成员，完成了第一轮东扩。北约还在华盛顿峰会上通过了北约新战略，提出“北约新的集体安全职权范围”，赋予北约在没有联合国或欧安组织授权的情况下部署北约军队的权力。1999 年 4 月北约将这一理念付诸实践，发起了未经联合国安理会授权的对南斯拉夫联盟的空袭。北约轰炸南联盟打破了俄罗斯对西方的信任，强化了俄罗斯对北约的负面看法。1999 年 6 月 12 日，俄罗斯在普里什蒂纳空降了一批伞兵，与北约部队在该机场发生短期的对抗，这成为俄罗斯激烈反抗北约行为的一种象征。但是由于实力不济，俄罗斯最后只能根据西方的条件解决了这场冲突^①。作为报复，俄罗斯冻结了与北约的所有关系。俄罗斯认为，北约在南联盟的军事行动意味着它干预俄罗斯内政的可能性无法排除，北约已经对俄罗斯国家安全构成严重威胁。为了防止安全环境继续恶化，俄罗斯必须阻止北约的下一步行动。俄罗斯丧失了对北约的信任，俄罗斯—北约之间的安全困境正式被激活，且迅速恶化，双方关系进入低谷。

在安全困境形成的过程中，俄罗斯—北约双方也曾经有意识地采取合作行动以求化解双方关系中的危机。俄罗斯与北约在反恐等方面存在共同利益，这在短期内推动了双方关系的回暖。2001 年发生的“9·11”事件给俄罗斯—北约关系解冻带来了机会。俄罗斯希望与北约重新建立伙伴关系，提供阿富汗战争所需的情报、基地和交通路线，展开国际反恐合作。面对俄罗斯的示好，北约也以善意回报，在莫斯科设立了军事联络团，以支持双方的军事联系。2002 年北约—俄

^① Алексей Громыко, *Карибский кризис 2.0? Ядерный фактор в прокси - войнах*, https://russiancouncil.ru/analytic - and - comments/analytic/karibskiy - krizis - 2 - 0 - yadernyy - faktor - v - proksi - voynakh/? sphrase_id = 94105629, 上网时间: 2022 年 11 月 3 日。

罗斯理事会的建立是这一时期俄罗斯—北约关系回暖的重要标志。北约—俄罗斯理事会作为双方沟通合作的代表性机制，反映了双方都有合作的愿望，但它始终存在着约束力和有效性不足的缺陷。双方在该机制中的地位明显不平等，俄罗斯在核心问题上没有表决权，提出的一些建议无法得到北约的重视。这就导致俄罗斯—北约双边合作机制运作无效，平等协商从未真正实现，双方战略互疑难以消解。

北约的第二轮东扩使俄罗斯感受到了更加紧迫的安全威胁。2004年3月，斯洛伐克、保加利亚、罗马尼亚、斯洛文尼亚和波罗的海三国成为北约新成员国。北约随后在波罗的海三国境内大规模部署常规部队，建立了针对俄罗斯的预警雷达。俄罗斯对北约的疑虑不断加深，这种疑虑在格鲁吉亚和乌克兰这两个国家寻求加入北约的过程中急剧上升。普京认为格鲁吉亚和乌克兰加入北约是对俄罗斯的直接威胁。俄罗斯一再表示，如果格鲁吉亚和乌克兰被纳入北约，莫斯科将采取必要措施。2008年8月俄格战争就是俄罗斯通过军事行动来宣示这一严正立场的表现。由于格鲁吉亚不是北约志在必得的首选国家，因此俄格战争对俄罗斯—北约关系的伤害也较为有限。作为对俄罗斯进攻格鲁吉亚的回应，北约冻结了与俄罗斯的大部分军事和政治合作，同时俄罗斯也暂停了与北约的军事演习和合作。俄罗斯与北约关系再次进入冰封状态，俄罗斯—北约安全困境再次升级。这一时期俄罗斯—北约双方战略互疑进一步加深，双方展开了激烈的军备竞赛。图2是2007~2009年俄罗斯与北约主要大国军费支出的对比，双方在这一时期内军费开支都有明显的增长，双方关系呈现出紧张加剧状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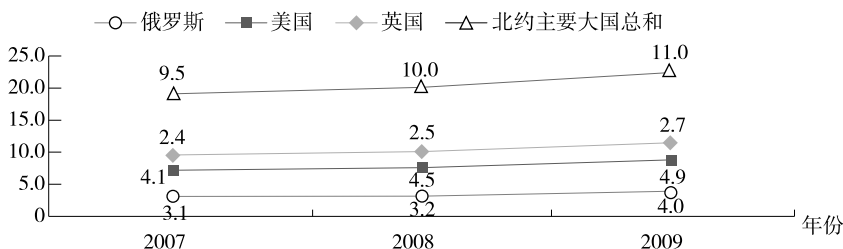


图2 2007~2009年俄罗斯与北约主要大国军费支出占GDP的比重(%)

数据来源：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SIPRI Military Expenditure Database, <https://www.sipri.org/databases/milex>

2009年奥巴马政府的“重启”俄美关系政策为俄罗斯—北约关系的改善再

次带来机会。北约同意与俄罗斯讨论建立战略伙伴关系，这让莫斯科有理由希望双方在欧洲联合导弹防御系统的基础上形成统一的安全空间。北约与俄罗斯的关系在此政策影响下出现了适度的改善。2011 年俄罗斯本着战略伙伴关系的精神，在联合国安全理事会授权北约在利比亚上空设立禁飞区投了赞成票，这导致利比亚政权发生更迭^①。如图 3 所示，2009~2014 年双方在军费开支上都没有大幅增长，北约军费开支甚至出现缩减趋势，双方关系有所回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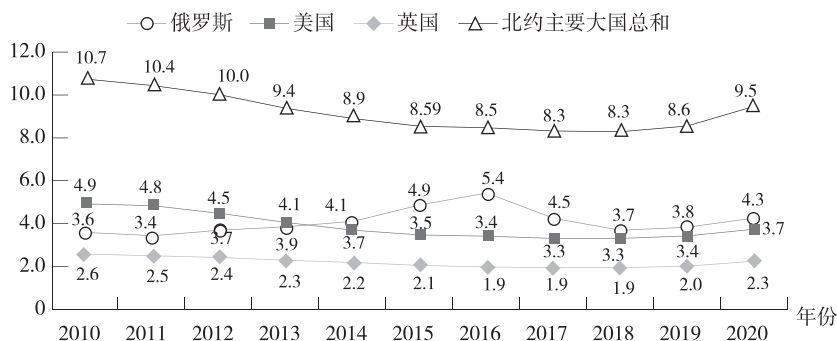


图 3 2010~2019 年俄罗斯与北约主要大国军费占 GDP 的比重 (%)

数据来源：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SIPRI Military Expenditure Database, <https://www.sipri.org/databases/milex>

尽管这一时期俄罗斯和北约在许多领域寻求合作，但双方存在分歧的关键问题仍未解决。2014 年 3 月，在俄罗斯和美欧的深度博弈之下，乌克兰政权发生更迭，俄罗斯借机合并克里米亚，并策动了乌东两州的自治运动，这导致俄罗斯—北约安全困境进一步升级。在北约积极吸纳乌克兰的同时，欧盟对这一东部邻国的深度介入直接触及了俄罗斯国家安全的红线，俄罗斯对乌克兰采取了主动性综合行动，以使其丧失作为北约候选国的条件。北约谴责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宣布中止北约—俄罗斯理事会所有的民事和军事合作。北约还大幅增加在俄罗斯西部边境的军事存在和实际活动，各成员国共同采取了一系列对俄制裁措施。如图 3 所示，2014 年以后，俄罗斯开始加大军费开支，而北约的军费下降趋势也就此结束，这从侧面印证了此一时期双方紧张关系的开启。

自 1999 年科索沃战争爆发，俄罗斯与北约之间的“休眠”安全困境被激活，

^① Дмитрий Тренин, Какую роль на международной арене сегодня играет НАТО. <http://svop.ru/main/42685/>, 访问时间：2022 年 7 月 22 日。

此后迅速地恶化为“深度”安全困境以来，双方之间的安全困境逐步升级。在此期间，双方尽管摩擦不断，但始终以加强自身的国家安全为目标，并没有显示出直接军事进攻对方的战略意图。其根源在于俄罗斯—北约双方之间存在一些重要的限制性因素，能够促使双方保持克制，延缓紧张事态升级。

（三）限制俄罗斯—北约安全困境升级的因素

俄罗斯与北约之所以能够停留在“深度”安全困境阶段，是因为双方关系中存在着一些重要的制约因素，能够将两方的恐惧和敌意控制在一定范围内，从而延缓双方的安全困境升级。这些因素从心理和物质两个层面上发挥着作用。

第一，欧洲外交政策趋向独立是缓解俄罗斯—北约关系紧张的重要因素。北约作为一个国际组织，其内部成员间存在复杂的关系。近年来，欧盟谋求在对美关系中更加平等的地位，争取获得决策的独立性。在这方面，欧洲内部出现了分化，一些国家在缓和与俄罗斯关系上取得了成效，这反映出欧洲在争取独立政策上存在着基础。例如，尽管“北溪-2”天然气管道项目一波三折，但是德国依旧顶着美国的压力坚持与俄罗斯将该线路建成。美国虽然处心积虑想拆解欧洲对俄罗斯的能源依赖，但对此也不得不作出了让步。这反映出美国控制欧洲的能力有所下降。欧美在对俄政策上的疏离有可能推动欧洲的战略重点向欧亚大陆倾斜，其对美独立性将继续增强，这给俄罗斯带来改善俄欧关系的希望。2014年乌克兰危机后，欧盟采取了针对俄罗斯的经济和外交制裁。但是对俄制裁同样伤及欧洲经济利益，缓和与俄罗斯的关系才有利于欧洲在经济上获利、安全上减缓威胁。欧盟试图在确保自身能源安全和维护美欧盟友关系之间保持平衡，这在俄罗斯看来是其破解北约军事威胁，发展俄欧关系的重要机会。俄罗斯一直想利用能源合作关系拉拢欧洲国家，达到分化北约的目的。即使在2022年双方关系恶化，“北溪-1”和“北溪-2”管道被炸之后，俄罗斯依然寻求与土耳其的能源合作，以求打开新的通往欧洲的能源通道。

第二，俄罗斯的核武优势具有较强的威慑能力。俄罗斯拥有苏联遗留下来的绝大多数核武器和装备，其数量如表1所示。时至今日，这一优势仍然在俄罗斯的对外战略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在核武器上的优势使俄罗斯在谈判中拥有讨价还价的资本，使用核武器的决心更能够加强核威慑力。俄罗斯曾经表示，如果俄罗斯都不存在了，还要这世界干什么^①，表明了其不惜运用核武器来捍卫自身利益

^① <https://www.chitalnya.ru/work/2424869/>

的决心。这客观上能够增强俄罗斯信心，也降低了俄罗斯对北约的恐惧。由于核武器的巨大威力和毁灭性后果，对一个拥有二次核打击能力的俄罗斯发动攻击将会对自身的生存和安全造成致命打击，这是北约国家所忌惮的。俄罗斯在核武器上的优势极大地提高了北约发动战争的成本，降低了其直接参与战争的可能性。由于俄罗斯在西方制裁下经济发展受阻，其军事力量也无法得到有力的保障，为了维护国家安全和支撑国家的对外战略，俄罗斯必须充分利用好核武优势。

表 1 2022 年俄罗斯与北约间核弹头数量对比（单位：枚）

俄罗斯	5 977
美国	5 428
法国	290
英国	225
北约	5 943

数据来源：美国科学家联合会官网、Status of World Nuclear Forces. <https://fas.org/issues/nuclear-weapons/status-world-nuclear-forces/>

第三，北约在常规军事实力上的优势是制约安全困境升级的另一原因。相比俄罗斯，北约的优势无疑体现在常规军事实力上。北约的常规军事实力及其在俄罗斯周边地区的军事部署给俄罗斯带来巨大的战略压力，提高了俄罗斯对周边地区进行军事行动的成本，限制了俄罗斯的对外进攻倾向。基于此，俄罗斯需要避免与北约发生直接的军事冲突，因为与北约的常规战争意味着失败，而这将逼迫俄罗斯使用核武器，由此带来世界和自身的毁灭。图 4 是俄罗斯与北约主要大国 2014~2021 年的军费支出对比（按 2020 年不变美元价格和汇率计算）。双方军费开支差距巨大，且北约的开支仍呈现出不断增长的趋势，而俄罗斯的军费投入受经济发展所限一度缩减，2018 年后尽管有所增加，但依然和北约之间存在巨大差距。

综上所述，俄罗斯与欧洲国家拥有发展各领域合作关系的深厚基础，政治、经济与人文方面的广泛联系有助于维护双方间的信任。美国的单边霸权主义行径有时能够促进俄欧双方在国际问题上的合作。俄罗斯和北约在核武器和常规军事实力上各具优势，这极大地提高了任何一方发起战争的成本和风险。由于对核战争毁灭性后果的恐惧，双方都认为对方不会轻易发动战争，这在一定程度上能够缓解对对方意图不确定性的焦虑，大为降低战争爆发的可能性。正是由于这些限

制性因素的存在，才使得 1999 年之后的俄罗斯—北约关系能够相互保持克制，俄罗斯—北约之间的“深度”安全困境处于稳定的状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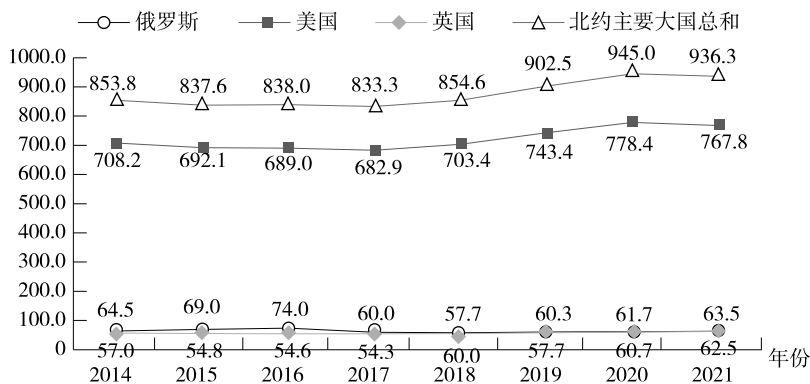


图 4 2014 ~ 2021 年俄罗斯与北约主要大国军费开支（单位：亿美元）

数据来源：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SIPRI Military Expenditure Database, <https://www.sipri.org/databases/milex>.

（四）2022 年俄乌冲突下俄罗斯—北约安全困境的升级

尽管安全困境在一定条件下能够得到延缓，但如果导致双方陷入安全困境的根本原因——国际社会无政府状态下对对方的恐惧和不确定性得不到有效解决，那么这一延缓作用注定是暂时和有限的。2022 年俄乌冲突的爆发将双方再次推到了重要关口。北约通过对乌军事援助、情报技术支持、对俄全面制裁、文化舆论战等多种形式间接参与了俄乌冲突。北约的行动已经远远超过自身安全的需要，而具有针对俄罗斯的敌对性质，体现出对俄政策的进攻性现实主义特点。俄罗斯对进入乌克兰境内的外国援助物资和志愿人员进行了军事攻击，这接近双方发生直接军事冲突的临界地带。俄乌冲突使俄罗斯—北约双方的敌对认识和战略互疑急剧上升，这标志着俄罗斯—北约安全困境升级到了一个危险阶段。

当利益冲突双方的矛盾在主观上和客观上都不可调和时（即使客观上矛盾还存在调和的可能，但是在主观敌意下也往往遭到忽视），安全困境一般不适用了，因为一方或双方很可能已经是恶意的，并且双方都对此了如指掌。在这种情境下，除非一方屈服于另一方的要求，否则的话，双方走向冲突几乎是不可避免的。从现状看，俄罗斯—北约关系很可能已经进入了这一螺旋的起步阶段，目前

由于双方均采取较为克制的态度，以及限制安全困境升级的几项因素仍在发挥作用，双方关系表面上依然停留在安全困境。可以预想，如果螺旋进一步升级，下一步爆发直接战争或难避免。

安全困境需要双方缺乏恶意行动的意图，当一方或双方故意相互威胁时，它们之间不可能存在真正的安全困境^①。北约一直忽视俄罗斯的安全诉求，通过不断挤压俄罗斯的战略空间以获取最大程度的安全。美欧曾经利用各种手段拉拢和支持乌克兰倒向西方，并逼迫俄罗斯作出让步，西方并不认为这些手段是对俄敌对行动。俄罗斯在一再退让后，在乌克兰问题上不再让步，并采取间接性的进攻性策略，以使北约放弃吸收乌克兰。俄罗斯仅对乌克兰采取特别军事行动，而不是将北约国家作为打击对象说明，它不愿与北约发生直接战争。安全困境的动力是自我强化的，它导致双方更加严重的升级局势。北约的后续反应显示出其对俄政策转向了进攻性。2022 年 3 月 24 日召开的北约峰会发表联合声明指出，俄罗斯在乌克兰的军事行动已经彻底改变了欧洲的安全局势，北约将继续加强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和东欧地区的军事部署，北约成员国将继续加大军费开支。在实践中，北约成员国持续对乌克兰提供大量的军事情报、军事物资、舆论等各种援助^②，在第三国领土上训练乌克兰军队，对俄罗斯实施系统性全方位制裁，实质性地加大了参与俄乌冲突的力度。在此情境下，北约的目标已经不局限在维护和巩固自身的安全，而是要在行动上阻断俄罗斯的军事行动。以前北约不愿明确宣布对俄带有敌意的政策，现在则完全不必隐藏。欧美在反俄立场上达到了高度的统一。为了击败俄罗斯，美国不惜将欧洲作为对抗俄罗斯的受害者^③，而欧洲国家宁愿忍受能源短缺和通货膨胀之苦，也要对俄发起能源和金融制裁，这反映出其不惜代价遏制俄罗斯的决心。

无论俄罗斯或北约，任何一方转向进攻性现实主义，都意味着俄罗斯—北约之间的“深度”安全困境进入了导向战争的螺旋。然而现实情况是，无论俄罗斯还是北约都无法承受直接战争，乃至核战争造成的巨大代价。对于北约来说，

^① Randall L. Schweller, “Neorealism’s Status Quo Bias: What Security Dilemma?”, *Security Studies* 5, No. 3 (Spring 1996), pp. 114–55, p. 117.

^② 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美国情报部门向基辅提供了有关莫斯科号巡洋舰的位置信息，导致该舰于 2022 年 4 月 14 日遭到袭击后沉没。俄罗斯联邦国防部宣布，英国专家参与了 2022 年 10 月 29 日乌克兰军队在塞瓦斯托波尔袭击黑海舰队事件；英国还参与了炸毁“北溪-1”和“北溪-2”海底天然气管线的行动。

^③ Тимофей Бордачёв, Как относиться к угрозе пятой статьи НАТО. <http://svop.ru/main/43102/>, 访问时间：2022 年 8 月 23 日。

不用亲自下场，而是利用乌克兰击败俄罗斯是最佳的路线；对于俄罗斯来说，以最小代价征服乌克兰，破坏乌克兰加入北约之路是恰当的选择。因此俄罗斯和北约都不愿发生直接的军事冲突，在关键事态上不约而同地选择了隐忍和忽视的态度。尽管如此，俄罗斯—北约关系正在发生质变却是难以否认的现实。俄罗斯指出，自2月以来，俄罗斯边境附近的北约多国部队以及域外国家的军人数量增长1.5倍，超过3万人，而且还可能继续增长^①。5月18日，瑞典和芬兰放弃中立地位，申请加入北约，截至11月，30个北约成员国中有28个国家的议会批准了它们的申请。在6月马德里举行的北约峰会上，俄罗斯被正式称为对欧盟国家构成“最重大和最直接的威胁”^②。在北约政策的变化下，俄罗斯的安全环境继续恶化，特别是在波罗的海地区^③。俄罗斯不得不加强了与北约接壤地区（包括白俄罗斯边境）的兵力，核威慑力量也前所未有地被调动起来。北约的行动已经跨越了防御性现实主义的边界，其行动呈现出恶意的进攻倾向，俄罗斯加强核威慑的举措以防御为主，但也随时可能转向进攻，双方关系继续表现出互动升级。

在安全困境与导向战争螺旋之间，俄罗斯—北约关系面临艰难的选择。虽然俄罗斯—北约双方还未发生直接的军事冲突，但这一临界线已经被双方的触碰行为模糊化了。俄罗斯和北约都对临界线的确认采取极为慎重的态度，因为一旦确认跨越界线，双方都将无法控制战争的爆发及其走向。俄罗斯—北约关系中现有的限制性因素如能源合作、核武器、常规军事力量的差距都难以阻挡事态的发展。事实上，俄罗斯和北约间发生直接战争的危险已经空前严峻。2022年欧洲各国以及北约军费比重继续保持上升趋势，北约主要国家已经宣布扩大军费比重。一些国家开始进行应对核战的演习。9月21日，俄罗斯总统普京以电视讲话形式发布了动员30万军人的命令。为了保障军事供应，实施全国性的经济重整对于俄罗斯来说已经势在必行^④。进入12月，乌克兰发起的几次针对俄罗斯境

① 《俄防长：西方正在推动乌克兰冲突激化，不断向乌军提供现代武器和弹药》，<https://sputniknews.cn/20221102/1045213229.html>，访问时间：2022年11月2日。

② 德米特里·特雷宁，Какую роль на международной арене сегодня играет НАТО。 <http://svop.ru/main/42685/>，访问时间：2022年7月22日。

③ Алина Волкоморова, Баланс сил в регионе Балтийского моря: от нейтралитета до милитаризации。 https://russiancouncil.ru/blogs/a-volkomorova/balans-sil-v-regione-baltiyskogo-morya-ot-neytraliteta-do-militarizats/?sphrase_id=94105629，访问时间：2022年11月7日。

④ Василий Кашин, Почему ушли из - под Киева, не сумели произвести свои беспилотники и сохранится ли Украина。 https://russiancouncil.ru/analytics-and-comments/comments/pochemu-ushli-iz-pod-kieva-ne-sumeli-proizvesti-svoi-bespilotniki-i-sokhranitsya-li-ukraina/?sphrase_id=94105629，访问时间：2022年11月8日。

内目标的军事打击不排除有外部力量的配合，而这些事件随时可能成为俄罗斯扩大军事行动范围的借口。“深度”安全困境中的双方在恐惧和敌意的累积突破临界值后会发生意图的转变：从无恶意变为有恶意。当这一转变发生时，俄罗斯和北约都将被被动地卷入导向战争螺旋，任何一方都将骑虎难下。正是基于对上述理论规律的深刻认知，俄罗斯—北约双方才表现出空前的谨慎态度，竭力避免发生直接军事冲突。

社会科学理论的有效性在复杂的现实中并不是绝对的。虽然俄罗斯—北约关系明显在恶化，螺旋的战争方向也很明确，但是俄罗斯—北约关系的走向还存在另外一种可能，那就是双方共同努力，化解安全困境的升级。现实主义理论认为，国际社会的无政府状态是一个无法改变的常量，所以安全困境无法彻底解决，只能或多或少地进行缓解。如果在俄罗斯—北约安全困境中出现如下一种或多种现象，则双方关系有可能进入良性循环：第一，俄罗斯—北约双方通过在军事领域的主动收缩行动，向对方释放更多的善意信号，来增进彼此的信任。例如，可以通过宣布停止在某些地区的军事行动以及暂停某些军事计划，向对方“示善”^①，给双方关系的改善创造机会。第二，俄罗斯—北约双方恢复和建立直接的对话和谈判机制。在双方间合作机制均被废止的情况下，双方现在急需通过谈判和协商，建立有效的沟通渠道，并在制度设计上加以完善，给予双方平等的参与决策权，实现有效协商。第三，俄罗斯—北约双方通过善意互动，在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恢复和开展互利性合作，提高相互依存程度，寻找共同利益。例如，俄罗斯与欧洲国家恢复在能源领域的互利合作等。第四，俄罗斯—北约双方直接讨论加强战略稳定和恢复核军备控制的谈判等，这方面虽不能快速达成成果，但是却可以防止冲突的升级甚至失控。上述现象有助于俄罗斯和北约改变彼此的敌对认知。如果能够实现，则俄罗斯—北约关系有可能在螺旋升级的初期就开启逆向转变的进程，这将保持双方的和平状态，避免战争的发生。目前来看，俄罗斯—北约关系间尚未出现上述现象。在政策趋向上，俄罗斯—北约双方都以自身安全为由，希望通过多种手段彻底压垮对方，视自身的妥协退让为走向全面失败的先期选择。除了军事胜利，俄罗斯—北约双方都不承认还有其他可供选择的方案。

在当局者迷的困境下，国际社会能够从客观、中立的角度看到俄罗斯—北约

^① 尹继武：《国际安全困境的缓解逻辑：一项理论比较分析》，载《教学与研究》2021 年第 1 期。

双方在北约东扩问题上并非利益不可调和，在乌克兰冲突上也存在摆脱螺旋升级的机会。在此情境下，联合国与世界各大国需要从维护世界和平的角度出发，积极贡献智慧，并参与居间调解，劝和促谈，以实现危机局势的转圜。在此趋势下，国际法与国际组织作为制约俄罗斯—北约安全困境升级的第四种因素将会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

结 论

本文利用安全困境理论对冷战后俄罗斯和北约之间敌对关系的形成和当前双方矛盾的升级建立了一个分析框架。分析表明，这一框架对于俄罗斯—北约关系的走向具有较强的解释力。冷战结束后，俄罗斯与北约之间具备了安全困境的生成基础。在安全困境理论逻辑的影响下，双方自我保护的本能导致各自对更多安全资源的追求，这导致双方关系从“休眠”的安全困境发展到“深度”的安全困境。2022年2月俄乌冲突爆发后，俄罗斯—北约关系的“深度”安全困境进一步向战争螺旋转变，但仍然存在逆向转变的可能性。在不断升级的俄罗斯—北约安全困境三阶段中，双方的客观利益冲突始终存在着化解的可能，但是由于主观上双方态度在恶化，敌意不断增加，这导致双方认为客观利益冲突不可调节的倾向在增强，对立关系不断加强。

如果俄罗斯和北约能够意识到形势的危险性，积极构建沟通谈判的渠道，以政治协商寻求化解危机，在军事领域采取一些善意行动，在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恢复和开展互动与合作，那么就有可能缓解局势的升级，这对维护世界和平与稳定具有重要意义。在俄罗斯与北约的关系中，俄罗斯作为较弱一方，在面对北约的扩张行动时，更为敏感且容易反应过度。为了使俄乌冲突得到缓解，俄罗斯—北约关系能够重新走上正常轨道，北约作为较强的一方需要作出更多的让步，进行更多的自我约束，尤其是在吸纳乌克兰为新成员问题上应当重视俄罗斯的利益诉求。唯有如此，才能避免俄罗斯—北约关系螺旋升级。

（责任编辑 胡 冰）